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一方面军卷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一方面军卷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七部分文章 65 篇

一个忠实的革命“保保”

廖志高

英勇的无坚不摧的中央红军，浩浩荡荡地渡过了金沙江，打坍川西南小军阀刘元塘的部队，不数日就冲到并占领了越嵩^①县城。

好多的宣传员不疲倦地在通街的墙壁上门板上写着：“打倒刘文辉！”“活捉刘元塘！”“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不交租不还债！”“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标语，随着也就向老百姓解释了这些主张。

红军开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东西，很多群众分得了衣服和大米。红军买卖很公平，说话很和气，一般的群众都知道。

刚移到汉人地方居住的一个“保保”——王木冷听到了红军的这些主张，看见了红军的这些情形，特别是“取消苛捐杂税”这个主张，在他脑子里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红军初到时，他是存在着恐惧怀疑的心理，现在开始转变过来。

王木冷家里有七口人，自来就是租田耕种，每年收得的粮食，除纳租交款外，是不够全家人吃喝的。他经常还要到高山去砍柴来换米，卖短工一天只得工资大洋五分。他频年都是这样劳苦，才能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在红军影响之下，他那苦闷的头脑里发生了“红军是不是真正不要捐款？”“不知道能不能为我们解除痛苦？”的一些问题。

^① 即越西，下同——编者注。

“老板！红军不拉夫，不要捐款，红军是救穷人的，是穷人自己的军队。”一个红军见着他很和气地向他这样说。

“简直好！从前我们每月都要出款呢！”

“老板！你要不出款，你只有同我们一道去打倒刘文辉；要永远不交租，也只有武装起来去把豪绅地主的土地没收来大家分。红军里不打人，不骂人，穿吃大家都是一样的，你愿意当红军不？”

“愿意！”王木冷一边听着这个红军的谈话，一边想着自己全家七口人，都要靠着他维持生活，一年都劳苦，好日子也过不到一天。他决定了，他不顾家庭了，他坚决参加红军。

王木冷参加红军，首先就编在三军团四师通讯班。那天有两个“保保”也参加红军了，一个叫作魏自千，一个叫作古哈，他们三人都同编在一班里。魏自千抽大烟，红军每天都发给他一钱大烟。他们在红军中生活还觉得不错，因为每天都有肉吃有烟抽。

红军由泸定小路向着天全开发，他们担任了架电话的工作，每天到宿营地不得休息，要在滂沱大雨中架电话。夜深寒冷电话不通，王木冷也就很快地去修理，但是魏自千和古哈却感觉些不耐烦了，经常发出怨言。

在由越崧到天全的过程中，没有土豪打，粮食非常缺乏，大家都吃玉米，又没有好菜吃。魏自千连大烟也没得抽了，他动摇起来，想把古哈和王木冷组织起开小差。

首先古哈被鼓动了，他们两个就向王木冷说：再前进就没有粮食，只有饿死，不如跑回家去，既不受饿，也不吃这样的苦。

王木冷对革命的坚决，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都在这时充分地表现和证明出来。他不但不听他们的鬼话，而且以同志的态度，来批评教育他们。

“你们想跑回去，就是怕吃苦。我们参加革命，要刻苦耐劳才对。我相信假如你们跑回去，还是一定要被豪绅把你们杀了。望你们不要胆

大，我是坚决不干的。”

他们灰脸灰嘴地不敢继续再说下去，无精打采离开王木冷走向旁边去了。

天快明了，王木冷正在梦里听着人呼叫，惊醒过来，有人问他魏自千和古哈到哪里去了。他细想一回，气凶凶地说：“泥滋模区！（“保保”骂人的话）他们一定跑了，把他们捉回来枪毙！”

选自刘统整理、注释：《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260—261页。

廖智高，又名廖志高，曾用名王平、王子修，1913年生，四川冕宁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随军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中央粮委、长征先遣工作团干事，中央直属警卫营地方工作组组长、党总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中共西康区委书记，西康省委书记，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二党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政治委员，福建省政协主席，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2000年在北京逝世。

通过保保区

李得才

1935年5月间红军进入川康边境的西昌、冕宁，取道“保保”民族地区前进。红一师一团一营，奉命为开路先锋，当时的营长为现在的陈正湘司令员，我是该营的机炮排长。部队从冕宁县桥头镇出发，翻越山地刚进入保保区30里地，因“保保”不了解我军政策，以为红军也和蒋匪军一样，是来侵犯屠杀他们的，突然对我军来了个袭击，我军为了实现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一枪未放，但他们不明真义，把我营的工兵连及全营勤杂人员200余人掳去，剥去衣物。在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我军决定退出保保区，返回大桥。派遣红军代表带领通司，与“保保”接洽，并接请“保保”首领，商讨抗日大计，和少数民族解放问题。为了表示我军的大义和真心，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将军，与保保区首领结盟，从此获得了“保保”民族的谅解和拥护。当我军第二次进入保保区时，“保保”族的男女老少，抱着心爱的大公鸡，抬着稀饭和开水，烙着“锅块”（白面大饼），并有古装艳丽的少女跳着舞，在羊肠小道旁、在山丘的小场上，欢迎着红军的队伍。红军战士们唱着歌，喊着口号。高高兴兴地通过了保保区。

选自《新文萃》1950年9月15日。

李得才，1906年生，江西萍乡人。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七师二十团机枪连连长，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以重机枪掩护17勇士渡河。为此受到上级嘉奖，被授予“大渡河英雄”的光荣称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志愿军六十八军二〇三师副师长、河北保定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1960年在保定逝世。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

陈昌奉

过彝族区之前，心里真可以说是七上八下的，曾经想过：绕开这个地区走不行吗？但是，当彝族区远远地落在我们身后，崇山奇峰挡住了彝族同胞那高大、强健的身影的时候，他们那热情、豪放、耿直、爽朗的笑声、喊声，好像还在耳旁回响着，久久地回响着……

我们随主席继续前进。听说当时国民党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十几万兵马又在后边追我们，而我们的前面，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部队借着天险大渡河在“堵”我们，蒋介石妄图凭借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渡河以南。我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全力奋战，与敌人争时间，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往大渡河。

记得我们随主席先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沿大渡河上行，经过一个名叫摩西面的集镇，再去泸定桥，渡大渡河。

去安顺场的路依然是峰峦回环的山区，登上一个山头，忽然见远远的山脚下有一条银色的白带，它时宽时窄，时起时伏，左拐右绕地把周围的群山缠连在了一处。

主席站立在山头眺望了好大一会，指着远处的“白带”，对我们说：“那就是大渡河！”

我们聚拢在主席身旁，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也许是当时离大渡河还远，并没有真切感觉到大渡河的气势。走过这一山，大渡河又

不见了——只是河水的呼叫声告诉我们，大渡河离我们不远，我们就在大渡河身边行进着。经过这样几上几下，我们和大渡河也可以说是几见几离，及至又翻下一座山，进入一个盆地街镇才知道，这里就是安顺场。

安顺场街面不大。我们随主席穿过街心，大渡河便迎面扑来。这里有一个似码头样的小坝子。只见街头及附近的稻田里，桌椅板凳、箱柜竹篮等杂七杂八的东西，零零乱乱地倾斜在地下、水中。群众告诉我们，白匪知道红军要渡河，便强令群众烧房焚屋，群众为了保留这点生活用具，才搬到街上和稻田中来的。只是不待敌人纵火，红军已经赶到，白匪便逃走了。

主席到安顺场就赶往渡口。并且在这里接见了抢占渡口的部队负责同志，沿着安顺场渡口的沙地，边走边仔细地询问抢占渡口的情况。我们看这里河面并不很宽，但地势倾斜度很大，水流奔腾湍急，听部队负责同志说，每秒钟的流速在四米以上。我们到达之前敌人有重兵把守。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听抢渡部队的负责同志向主席汇报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同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连夜寻渡船以及飞舟强渡的经过。心里充满了对先头部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的崇敬！

看得出来，主席对抢渡的成功是很满意的。当部队负责同志说蒋介石妄想我们要作“石达开第二”时，主席爽朗地笑了。

在安顺场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主席冒雨带我们又出发了。

这一带尽是层层的山峦，山上长满了各样的乱草和干硬的小树，败叶陈枝腐烂在地面上，又加上下雨，行走起来十分困难。蜿蜒曲折的小路，由于山势和岩石的阻碍，时上，时下，总是在山上行进。山陡得很，路都像是凿在峭壁上，越往上走越难，杂草乱树也更多、更稠。有时不得不停下来，请工兵同志砍一阵再走。不管道路怎么样，天气怎么样，主席总是走得那么带劲，在他的脸上，找不到因长期行军作战和紧张工

作而留下的疲劳的痕迹。他经常回过头来照料我们，对我们讲话，有时还讲一些小故事。我们见主席这样，什么山高，什么细雨，满身的疲劳早就飞到九霄云雾以外去了。往上爬，往上爬，在山中间往四周看，什么也看不到，一登上山顶，大渡河水便像一条突降的凶龙，对我们大声呼叫起来。

天近黄昏，雨停了。我们刚爬上一座山头，有同志来向主席报告，说大部队已进占泸定城了。主席满意地听罢，笑着对我们说：“我们休息一下开饭吧。”

我们警卫员、担夫、饲养员等都围上来，在一条小溪旁坐好，拿出干粮，主席便和我们一起吃起来。饭不怎么好，又加上大半天的行军，嗓子眼里干得很，但大家都拼命地往下咽，我们知道，不吃下这点东西，走下一段路将更加艰难。

“啊呀！咱们光吃干的，没有点水喝怎么好！”林英才突然嚷了起来。

经他这么一提，我们更感到干得难受，嗓子眼里像在冒火。

主席望着我们笑着说：“你们看，”他指指我们身旁潺潺而流的小溪：“这不是水吗！”说着他自己用双手捧起一捧水喝了一大口：“这水很好，很清凉。”

见主席喝得那样香甜，我们也顾不得用手去捧，一个个伏下身子喝了起来。忽然传来了阵阵鼾睡声，不用看就知道，又是黄应和。

看黄应和睡得这么快，我们都觉得好笑。阙桂兰早就沉不住气了，用小缸子舀了半缸子水就要往黄应和脸上洒……

“阙桂兰，”随着声音，我们都转过眼去望着主席，“黄应和很累了，让他休息一会吧。”说罢，主席站起来走到黄应和身旁，把他那枕着杂草的头轻轻地抬起来，垫上了主席自己的衣服。

黄应和的身子微微一动，脸上露出一丝稚气的笑容，随即又睡去了。

我们几个人站在一旁，看着主席细致、轻微的动作出神了。主席回过头来，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也休息休息吧，明天还要前进呐！”

我们一声不响地在原地蹲下来。我靠在一块不大的石头上躺了下来。

初夏的黄昏，又是雨后，很凉爽。我虽然很累，但怎么也睡不着。看看黄应和枕着主席的衣服睡得那么香甜；再看看主席正漫步在山顶，像在考虑什么问题。远处大渡河水哗哗地响着，夕阳的余晖把满天烧得赤红，主席那身灰色的军装似乎变成橙黄色的了。我顺势刚想站起来，见我们班长胡长保同志迈着轻轻步子，往主席身旁走去。胡长保同志总是这样静静地守卫着主席……

这一夜，主席和我们大家一样，露天宿在这座无名的大山上。

第二天一早从这里出发，走了没半日，来到一座很高的山下，突然下雪了。这场雪对我们这些江西老表来说，可真正成了奇闻。因为当时正是5月底6月初，天气应当很暖和不说，昨天我们离安顺场的时候，不是还在下雨吗？就是刚刚翻过的几座山峰，还生长着、开放着许多叫不上名字来的绿草野花！怎么一转眼却下开了雪，而且冷得很。往山上看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好像又返回了贵州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马上取出衣服送给主席，并且七言八语地问主席：“这里怎么下雪了？6月也下雪吗？这是怎么搞的？”大家好像都忘记了天冷，只是好奇地望着这雪，望着这山，等待着主席的回答。

主席望着雪山，笑着对我们说：“这大半是一座小雪山。”

“雪山？”

“五六月天还有雪山？”

“不会吧？是真的吗？”

……

我们议论开了。

当时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前面还有更大更多的雪山在等着我们呐！

“是雪！是真正的雪！”随着喊声，见阙桂兰双手捧着一个雪团正往嘴里送呐！“真凉啊！”他啃了一口，又说。

于是，我们也不顾天冷，都顺手抓起了地上的雪花，嬉笑着往嘴里送。

“这在你们江西可是看不到的！”主席见我们那个兴奋劲儿，笑着说。

“我们福建也没有！”阙桂兰说。

主席点了点头，说：“我们那个湖南也没有呢！”

我们大家都笑了。

“主席，”这时，胡长保班长走到主席身边问：“翻这座山吗？”

主席看了看四周，说：“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泸定，要尽快赶去。”

“那您把鞋子换一下吧！”胡长保同志说，这时我们才想起主席还穿着用布编织的草鞋呢！

主席说：“不要换了，很可能翻过山去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那您把衣服穿好吧。”胡长保班长就是这样。当我们这些年轻人碰上个什么新鲜事，一兴奋把什么都忘了的时候，他总是仔细、周到地把主席的生活安排好。

主席说得真对。翻过这座山没走多久，不但天不冷了，雪不见了，路旁的崖上绿草、野花又出现了。“怪事，怪事，今天遇上了怪事！”我们一路走一路议论着。并且要求丁良祥讲一个雪山的故事。这一次丁良祥认输了。他说：“这雪山连见加听我都是头一回，你们让我现编也编不来了！”

快要走到摩西面^①的时候，遇上了一条河。河水很宽，很深，不能涉渡，只有一座不到两公尺宽的小桥，我们到时，部队正在过桥。人多桥窄，显得十分拥挤，大家见主席来到，马上让开一条路，请主席先过。主席还未说话，老余牵着马就上了桥。马一踏上小桥，受惊似地跳起来大声嘶叫，顿时桥上显得更拥挤，而且有点乱了。

主席赶到桥头，对老余说：“不要过啦，先让同志们过！”

“衣服和行李都在上面呐！”老余大声地喊。

我们几个警卫员也知道马上驮的是行李、衣服，如果马过不去，晚

^① 应为磨西镇，下同——编者注。

上主席就没有铺盖了。尤其刚刚翻过的那座奇怪的雪山使我们想，要是前面再碰到这么座山怎么办？所以我们都为老余加油：

“主席，慢慢地它就会过去了。”

“不过去怎么行！”

.....

“哎！”主席那慈祥的双目扫了我们一圈，然后对我说：“陈昌奉，赶快帮老余把马牵回来，让部队通过！”

虽然部队的同志都帮着老余拉马过桥，我还是跑到桥心，帮老余把马拉了回来。

我们把马拉回来，主席催着部队赶快过桥。一直等到部队过完，我们才随主席走过去。

这一带河很多，大概是大渡河的支流。有些河面上架着铁索桥。开初我们认为到了泸定桥了。但主席对我们说不是，这是一些小铁索桥。泸定桥大得很呢！

泸定桥到底有多大呢？

这一天，我们没有赶到泸定桥，而是宿营在那个叫摩西面的镇子上。

摩西面坐落在一块大盆地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有一个建筑得很不错的天主教堂，听说还有几个外国人。我们驻下后，刘振亭副官送来了好多罐头，说：“小鬼，这是给主席和你们的。”我说：“谢谢！”刘振亭副官拍了我一下，说，“怎么，和我还讲客气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刘副官是介绍我到主席这里来工作的，又是负责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生活的，这几年我们接触很多，他不仅对主席，对我们这些小鬼也是很关心的。刘副官走后，我从花花绿绿的商标上分辨出这罐头中有核桃、花生、大枣等，但是有两种罐头，外面画着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些有黄有红的家伙，看了半天，我们好几个人都猜不出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我拿到主席跟前问主席。主席看了看，笑了。他说：

“这东西你不认得。忘了？那一年我们从白云山下来追击敌人，从

富田到水南的路上，你搞来好多面包，朱总司令说有了面包就缺黄油、果子酱了。这就是那个黄油嘛！”主席又拿起一个罐头说：“这就是果子酱。好，这一下可齐全了。”

经主席一提，我不但马上想起了第二次反“围剿”时胜利追击的情景，而且在赣南、闽西那些年许许多多的情景，一下子拥满了脑海，竟拿着黄油和果子酱罐头站在那里不动了。

“这是哪里搞来的？”

主席问我话了，我才大梦初醒似地说：“是刘振亭副官送来的。”

主席说：“告诉刘振亭，请他给总司令和其他同志送一些去。给周副主席送一些去，他最近身体一直不好。”主席把那个黄油罐头递给我，又说：“你们要吃就留一点。我是吃不来这个东西的。”

“那就把我们的都给周副主席送去吧！”我说。

“好嘛！”主席高兴地说。

这天晚上，主席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我从来没有吃过的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西餐吧——吃饭中间，主席提出了白天过桥的事，他对我们说：

“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要想到部队，想到大家！你们想，为了我们一匹马，误了那么多同志行军，该多不好呀！”

离开摩西面，我们随主席到达了泸定。这里的河面较安顺场虽窄一点，但水势却更急，且两岸全是矗立的绝壁，长松短柏好像都挂在那悬崖峭壁上一样。泸定桥是用十几条饭碗那么粗的铁索构成的。桥头的地下有很多铁桩，铁索就系在铁桩上。桥两旁的扶手也是铁链的。真是名副其实的铁桥。摩西面那边那些铁桥怎么能和它相比呢！

主席到达泸定桥头的时候，桥头旁的城门楼上还冒着浓烟。主席在一座大教堂面前环视了一下，随即带我们过泸定桥。

桥上原来铺着的木板，差不多都让炮火打着或被敌人破坏了。我走到桥边，看到那碗口粗的铁索大桥和被烧焦了的木板，还有那奔腾的河

水，心里有些紧张。

主席看透了我的心思，指着我的头问：“陈昌奉，害怕吗？”

“不怕，咱们走吧！”我虽然这样说，但心里跳得很厉害。我看阙桂兰他们几个也有些紧张。是呀！像这样大而急的河流和奇怪的桥梁，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呐！

主席用双臂把我们几个小鬼拦在他的面前，说：“这座桥很有名，和我们走过的桥都不一样，你们年纪轻轻的能过这么大的桥，很简单！到了桥上不要心慌，不要往下看，掉不下去的。”主席停了停，又笑着问：“你们害怕不？”

“不怕！”我们几个人同声回答。

“好，咱们走！”

主席在前面，我们紧跟着。踏上铁桥，我的心像突然被什么吊了起来，跳得厉害。主席却走得那样轻松、自然，昂首眺望着两岸直入云霄的绝壁。巨大的河水咆哮声，似乎也不能打断他的思虑。走到桥中间，大概是由于人多，铁桥开始左右摇摆开来。我一把抓住身旁的铁链停了下来。主席回过头来和我说话，但因河水声响太大，我根本听不清，看样子是问我怎么样。我摇摇头表示没有关系。主席停下来拉着我的手，一起往前走。也不知是大半天没出什么事，还是因为我的手被主席拉住了，我的胆子顿时大了起来。原来轰轰响的耳朵，也忽然能分辨出各种声音来了。我低头往桥下看去，只见浑浊的河面上腾起的巨浪，像无数把锐利的长剑，直插大桥，使人看了真有点头昏眼花的感觉。抬头看我们桥上的同志，有的站着一步一步地挪动；有的全身伏在铁索上匍匐前进；有的几个人拉成一行，连说带笑地前进……

主席一面拉着我的手，一面不停地回头看着大家，有时也停下来，向大家摆手、说话，或者站在铁链旁极目远望……

横跨在大渡河上的铁索桥，终于落在了我们的身后！

“主席，”到达岸上，我走到主席身边说，“这样的桥，有我们一